

新橋譯叢 11

8 歐洲經濟史《中古篇》

契波拉編

夏伯嘉譯



吳氏基金會

新橋譯叢 歐洲經濟史《中古篇》

11

編者／契波拉

譯者／夏伯嘉

歐洲經濟史〈中古篇〉

編者／契波拉

譯者／夏伯嘉

總主編／康樂

編輯委員
石守謙・吳乃德・梁其姿
章英華・張彬村・黃應貴
葉新雲・錢永祥

責任編輯／陳忠信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7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392-3707

傳真／3410760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05)227-3193

總策劃／吳東昇

策劃／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11樓

電話／(02)507-2606

電腦排版／正豐電腦排版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35巷7弄1號2樓

電話／(02)741-4749

印刷／弘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汀川路782號6樓之6

電話／(02)321-5808

1989(民78)年7月16日 遠流一版

(印數1~200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295號

售價34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Middle Age
(London, Collins Press, 1972)

總序

這一套《新橋譯叢》是在臺灣新光吳氏基金會獨力支持下進行編譯的。其範圍廣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幾個最重要的部門，包括哲學、思想史、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我細審本叢書的書目和編譯計劃，發現其中有三點特色，值得介紹給讀者：

第一、選擇的精審 這裏所選的書籍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學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如韋伯(M. Weber, 1864—1920)和涂爾幹(E. Durkheim, 1858-1916)的社會學著作。經典著作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作者雖已是幾十年甚至百年以前的人物，但是他們所建立的典範和著作的豐富內涵仍然繼續在散發著光芒，對今天的讀者還有深刻的啓示作用。第二類是影響深遠，而且也在逐漸取得經典地位的當代著作，如紀爾茲(C. Geertz)的《文化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孔恩(T.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等。這些作品是注意今天西方思想和學術之發展動向的中國人所不能不讀的。第三類是深入淺出的綜合性著作，如帕森思(T. Parsons)的《社會演進》(*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契波拉(Carlo M. Cipolla)主編的《歐洲經濟史論叢》(*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這些書的作者都是本行中的傑出學人，他們鉤玄提要式的敘述則可以對讀者有指引的功用。

第二、編譯的慎重 各書的編譯都有一篇詳盡的導言，說明這部

書的價值和它在本行中的歷史脈絡，在必要的地方，譯者並加上註釋，使讀者可以不必依靠任何參考工具即能完整地瞭解全書的意義。

第三、譯者的出色當行 每一部專門著作都是由本行中受有嚴格訓練的學人翻譯的。所以譯者對原著的基本理解沒有偏差的危險，對專技名詞的中譯也能夠斟酌盡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譯者全是年輕一代的學人。這一事實充分地顯示了中國在吸收西方學術方面的新希望。

中國需要有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瞭解西方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這個道理已毋需乎再有所申說了。瞭解之道必自信、達、雅的翻譯著手，這也早已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了。民國以來，先後曾有不少次的大規模的譯書計劃，如商務印書館的編譯研究所、國立編譯館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都曾作過重要的貢獻。但是由於戰亂的緣故，往往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像本叢書這樣有眼光、有組織、有能力的翻譯計劃，是近數十年來所少見的。我十分佩服新光吳氏基金會的深心和魄力，也十分欣賞《新橋叢書》編輯委員會的熱忱和努力。我希望這套叢書的翻譯只是一個新的開始，從初編、二編、三編，不斷地繼續下去。持之以恆，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一定會從翻譯進入創造的階段。是為序。

余英時

1984年9月5日

——導 言——

資本主義與物質生活： 歐洲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探討

夏 伯 嘉

我們正在翻譯的這套經濟史叢書是十年之前出版的，因此，近幾年來的學術研究成果當然無法顧及。再者，這套叢書簡略扼要地介紹一千多年之歐洲經濟的全面發展，着重敘述史實，一些重要的爭論問題亦未能詳細談及。因此，我們以這篇導言當作一個研究討論，分別介紹歐洲經濟史中近十年來研究上的公論與爭論課題。本文討論的範圍，自中古後期到工業革命的前夕（約十三至十八世紀中葉），先簡略敘述兩個研究結果，接着再簡述一個爭論的題目。

(一)兩個長期的經濟循環

根據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的看法，人口生長率之速度，遠遠超過物質資源的增長率。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人口不斷增長的最終結果，只會使耕地疲弱，糧食短缺。唯一的解決辦法是人口

銳減，使人口與資源的對比達到新的平衡。危機過後的社會，再度的發展又支持着人口的增加，直到這循環發展又碰到一個新的危機爲止。

中古歐洲的農業技術水平很低，農產量大多只能維持農戶一家的需求，不可能累積大量的剩餘勞動力，以支持大規模的工業發展。因此，中古歐洲社會一直不能逃出這循環發展。自公元一千年至一千四百五十年可算是一個完整的循環發展期；第二個經濟循環自一四五〇年至一七五〇年止。要等到工業革命興起以後，歐洲經濟才突破這個農業社會的循環發展。以下我們分別看看這兩個循環期內的分期。

自公元十一世紀開始，歐洲戰火稍歇，社會漸趨安定，農民得以休養生息，城市商業亦開始蓬勃。經濟繁榮，人口激增，墾田運動在各地開發了原始森林。十二、十三世紀是日耳曼民族向東移民運動的高潮。十三世紀的歐洲，已有國際性的貿易系統與工業區：意大利北部和比利時西北部市鎮密佈，工業繁榮，代表了歐洲最先進的地區。中古工業的主要產品——布匹——是統治階級的奢侈消費品。紡織工業生產名貴的羊毛衣，重質不重量，城市工業與農村經濟之間，仍然存在着一道深溝。這一段經濟發展期約於一二五〇年達到高峯，其後種種危機的“病徵”接踵而來。在農村，人口激增的結果，造成每一農戶耕地面積不斷分割縮小。兩、三代下來，每一農戶的田地雖然還勉強可以維生，但一遇災害便沒有退路。隨着森林的過度開發，移民墾田運動亦告停止。土地資源與人口對比之差距繼續拉遠，造成糧價高漲，工資下跌，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大爲下降。

十四世紀初農作歉收，低地國家鬧饑荒，循環期已開始轉入危機的前夕。黑死病（1348-1352）肆虐前的農村社會，有大批無地農民在饑餓的邊緣上掙扎。鼠疫肆虐只是加速危機惡化的一個外來因素而已。有學者認為，一般平民營養不良，抵抗力薄弱，因此鼠疫期間死亡枕藉，人口損失高達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引起危機的決定因素，絕對不是偶然的病疫，而是社會經濟結構本身的問題。

人口大量死亡，很多農村變為荒野。整個經濟萎縮不振：這個循環的低潮大約在一四〇〇年時，到了一四五〇年後經濟才慢慢恢復。危機帶來兩件重要的經濟史實：一是農作物價格長期低落；二是因人口劇減，為了取得足夠的勞動力，地主與資本家不得不減租加薪。因此，這一百多年間的經濟倒退，既嚴重地威脅了貴族地主和教會的權力，又提高了一般農民、工匠的購買力。隨着生產力慢慢恢復，人口又再增長，歐洲社會亦從中古封建期踏進一個新的紀元。

第二個循環期亦可以分為兩個段落：十五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是經濟發展期；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是經濟蕭條不振的時期。

從十五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中葉這段時間內，我們又可以劃分前一段快速發展期與後一段緩慢發展期。上半期（1450-1550）間人口增長很快，刺激了糧食生產和農業發展。以前被遺棄的田地，一部份又再度變成耕地。農產品的價格，尤其是穀物，節節上昇，漸漸把工資遠遠拋在後頭。這是歐洲工、商業的另一個黃金時代。一些商人投資採礦、經營貿易、開創銀行，累積了富

可敵國的雄厚資本。德國奧古斯堡的富格爾家族（Fugger）便是最有名的例子。

到了十六世紀中葉，農村的人口密度已達飽和點，個別農戶的生產率因資源分配不足而開始降低。雖然這數十年間，西班牙自中、南美洲輸入大量的白銀，為歐洲提供了可以刺激經濟的資本，但是這筆龐大的財富，大部份消耗在西班牙帝國的軍費上。當然，軍事消費或多或少也推動了工、商業發展；低地國家與意大利將近一百年的經濟繁榮，實依賴兩地與西班牙的密切關係。到了十七世紀初，西班牙帝國呈露疲態，白銀輸入漸枯竭，工、商業轉趨低弱。

總括來說，農業生產的問題，是十七世紀經濟危機的主要因素。除了英國、荷蘭與北意大利外，十六世紀一百年的資本累積，很少投資在農業生產上。城市富商收購田地，目的不在投資促進農產，而在坐收地租；他們高價取得莊園封號，渴望能搖身一變為貴族地主階級。

人口的壓力，於十七世紀初已明白地顯現出來。除了英國和荷蘭外，歐洲大部份地區的經濟發展，開始停頓下來。十七世紀的危機到底在什麼時候開始呢？學者的答案不一。西班牙的衰落，自十七世紀初到三十年代的民變，每況愈下；意大利在一六三〇年的瘟疫中，元氣大傷，威尼斯共和國開始變為經濟、政治的次等國家；德國於三十年戰爭中（1618-1648），損失三分之一的人口，工商業發展倒退幾十年；法國的經濟，亦因為要負擔沉重的軍費長期低落不進。就算是新興的經濟強國——荷蘭——亦難免走入經濟低潮期；它的人口和生產量，於一六七五年後一反

前態，倒退不振。

唯一能夠逃避這第二個長期循環發展的是英國。十七世紀的英國內戰，並沒有妨礙到兩百多年的經濟發展（1500-1700）。研究近古英國經濟發展的專書、論文，實在不勝枚舉，我們無法在此敘述。如果要我們試舉其經濟發展的特色，那就必須強調英國農業的商業化和英國海外市場的開發。簡而言之，英國的農、商、工業，通過一複雜廣泛的國內、外市場，迅速發展為聯合的體系，為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打下了基礎。這一來，西歐其他的國家，亦得以效法英國的榜樣，分別於十八、十九世紀，發展了自己的工業，跨越過傳統農業社會的長期經濟循環，進入了現代工業資本主義歷史期。

(二) 農業資本主義與商業資本主義

研究工業革命的學者，最近十年來特別注意探討農、工、商業之間的關係。他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為什麼幾個在中古與近古時期的經濟先進區，會於十七、十八世紀停頓在農、商社會的階段，而無法進展為工業社會。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加拿大蒙特婁（Montreal）舉行的一個國際史學討論會，以“邁向工業社會演進的失敗”為主題，專門探索、比較近古時期意大利與荷蘭的經濟發展，意圖得悉這兩個先進的經濟地區遲遲不能全面工業化的原因。以下我們分別簡介這次會議幾個公論與爭論點。

意大利是中古歐洲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

城邦有好幾個富可敵國；威尼斯與熱內亞的商人，足跡遍及歐、亞、非三大洲；佛羅倫斯的羊毛衣、盧加的絲綢、米蘭的鐵甲，皆名冠全歐；北歐的金融，也都被意大利錢商操縱。雖然黑死病與其後的瘟疫，使意大利社會元氣大傷，十五、十六世紀初連年的戰役，亦帶來了嚴重的破壞，但是十六世紀下半葉的意大利，仍舊是非常繁榮的地區。帕辰察（Piacenza）位於意大利北部的倫巴第區，是歐洲債券買賣的金融中心；熱內亞的鉅商是西班牙帝國的銀行家；威尼斯仍然是不可忽略的海商強權；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既是西班牙帝國的政、軍重鎮，又擁有二、三十萬人口，是西歐最龐大的都會——就算在十七世紀，也只有倫敦和巴黎的人口比它更多。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十七世紀的二十、三十年代，北意大利的工業面臨着嚴重的危機。在一六〇〇年威尼斯織布業年產布二萬二千多匹；在三十年代年產量降為一萬二千匹；到了十七世紀末竟低至二千六百匹。同樣地，米蘭的鐵器工業和佛羅倫斯的織布業亦一蹶不振。十七世紀初，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已取代北意大利而興起，成為全歐的金融中心。

意大利工業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經不起北歐的經濟競爭。意大利織布業沒落，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意大利歷史悠久、名氣遠播的傳統織布業，不願適應十七世紀的新市場。由於墨守陳規，意大利生產奢侈昂貴的厚重布料，很快便被輕薄廉價的英國“新布料”奪取其海外市場，隨後更連國內市場也喪失了。除了頑固守舊，意大利的布商又受到各布業行會的壓力。織工、布匠等皆反對布商外移資本，排斥以農村的廉價勞力來生產之“新布料”

”。憑着行會的政治力量，工匠們堅持領取較高的工資，強迫布商提高製作成本與售價。眼看着工、商業利潤慢慢地被製作成本侵蝕，企業家遂將資金大量轉移投資到農業。

隨着資本流入農村，城市商人亦變為貴族地主。棄商置田產的用意，多是為躋身門第，而不是為提倡農產。不過，北意大利倫巴第區市鎮密佈，刺激了農業生產。再加上城市資金大量流入，該區的農業很快地商業化，專門種植鄰近城市所需的稻米、蔬菜、橄欖油、水果和蠶絲。十七世紀倫巴第商業化農業，為十九世紀的工業建設提供了基礎。

學者辯論意大利工業衰落之原因，除了強調西北歐的競爭外，更指出兩件重要的史實。第一是近古時期意大利社會貧富懸殊，因此本土的工業無法依賴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織布業不願改而生產大眾需求的廉價輕布，正是因為意大利社會缺乏真正的“中產”階級。近古的意大利社會主要是由貴族地主和農民構成；工、商團體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力量，遠不如中古盛期的城邦社會。第二是舊教（天主教）勢力的復興。十六世紀下半葉與十七世紀是舊教反撲新教（基督教）的鬥爭時期。各教皇、主教在意大利各地大興土木，建宮庭、教堂、慷慨支持藝術家。這段時期是意大利宗教藝術最輝煌的日子，羅馬偉大的建築物和藝術，代表了教廷百餘年的投資與苦心經營。很可能當時的資本和人材皆被宗教吸收去了；那時代的文化精神一反中古實事經營之心態，提倡追求宗教之光榮與永生之超度。

低地國家在中古時期原本是一個政治體系，南部（今比利時

）的經濟一直較為先進。自反抗西班牙暴政的獨立戰爭（1568-1648）後，南北分裂，北方七省結盟立國，由荷蘭一省領導，南方仍歸西班牙統治。獨立戰爭的八十年間，可算是荷蘭的黃金時代。新小國的商船隊，十餘年間便躍居世界首席。大批資金和技工從南方逃到北方，為荷蘭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

荷蘭國境低平狹小，人口稠密，必須大量進口糧食。沿海地區市鎮密佈，農業受到城市市場之刺激，很快便高度的專業化。在農、商的雙管推動下，荷蘭迅速發展為歐洲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研究其原因，可歸納為三：

（一）荷蘭與鄰近各省的耕地，多在農民手中，貴族莊園只佔極小的面積。再者，其地市鎮林立，封建教會與貴族的政治力量實微不足道。換句話說，正因為荷蘭在中古後期是落後的地區，封建莊園制度的根本基礎不牢固，故日後的農業技術革命，沒有碰上舊社會這一阻礙。在農業革命過程中，傳統的緊密農村社團漸漸解體，個別農戶分散的田地開始集中在少數富農的手中。農村中的剩餘人口，一部份變為領薪資的農工，一部份從事農村的手工業製作，再一部份則流徙到城市、海港，充當工匠、碼頭工人與海員。由於耕地集中，富農大規模經營，既可減低成本，又有足夠的資本改良農具，增加農業生產。農業的專業化與農產量突飛猛進，便是這項農業革命的成果。

（二）荷蘭一省的收入，已抵聯邦政府每年開支的一半。而阿姆斯特丹一城，除了是全國第一大城市外，更控制了荷蘭省，支配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生活。構成阿姆斯特丹的統治階層，正好是大商賈與銀行家。他們組織合股公司、股票與金融市場，擁有銀行

、商船隊。農業之商業化與城市龐大人口之糧食需求，又給他們帶來投資聚利的機會。在十七世紀的上半葉，單單在荷蘭一省，商人投資填海以增闢農田的資金，就遠比有名的荷蘭東、西印度兩合股公司的創業總資金為多。

(三)上述兩項發展，都不是單獨發展的現象。荷蘭經濟發展之突破，主要是城市與農村這兩個經濟體系，互相配合結成一體。城市人口極度稠密，給農業提供了理想的市場；源源不絕的城市資本，又支持着農業的技術革命；城市工商業的擴張，使無地農民獲得就業的機會。另一方面，農業亦緊緊地追隨、適應城市經濟的需求。除了種植穀麥外，農夫又生產牛奶、乳酪、肉類、蔬菜、啤酒與泥煤，大批地運往城市。於是全國變為一個大市場，由無數的道路與新鑿的運河網運接着。

荷蘭經濟的黃金時代，歷時百年。自一六六〇年後，經濟發展開始緩慢，來登（Leiden）的織布工業走上了沒落的斜坡，其他的工業製作亦不能突破傳統生產的門檻。到了十七世紀末，英國之商業艦隊的噸位，已超過荷蘭而稱霸全球。到了十八世紀初，荷蘭的農業生產，亦被英國迎頭趕上。

學者討論荷蘭在十八世紀衰落的原因，意見紛歧不一，大致有下列各種看法：

(一)爲了爭霸海洋與商場，英國與荷蘭在十七世紀打了三場戰爭；荷蘭所花的海軍軍費非常浩大。再者，法王路易十四垂涎荷蘭的財富，連年發動戰爭，使荷蘭勞民傷財。

(二)到了十七世紀中，控制城市政權的統治家庭，大多已放棄商業，專門投資放債，坐收利息。到了世紀末期，這城市政治階

級的成員，已從工、商業資本家變為城市貴族階級。

(三)荷蘭農工業發展突飛猛進，農村人口紛紛湧進城市，或遠洋航行，勞動力漸漸供不應求。結果是工資不斷提高，工人們擁有頗高的消費能力。十七世紀間，荷蘭工匠的工資為歐洲其他國家工人的工資兩、三倍之多。這種情況從好的方面來說，是平民享有全歐最高的物質生活水準；從壞的方面來說是製作成本提高，投資工業的利潤低微。因此，十七世紀初的荷蘭商業資本主義，終於不能發展成工業資本主義，而轉入金融資本發展的途徑。

(三)從封建社會過渡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爭論

英國既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其經濟發展的歷史自然是研究的熱門課題。中古時期英國的經濟較落後，務農為主，輸出羊毛，進口工業製成品。甚至到十五世紀末，羊毛仍然是英國的主要輸出物。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在二百多年間脫胎蛻變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其中的轉變過程與推動因素，成了學者們爭論的題目。

英國一本史學雜誌《古與今》(Past and Present)，在一九七六年七十期號登載了一篇論文，題名“農村階級結構與工業期以前的經濟發展”，引起了一場歷時七年的大論戰。作者羅拔·布里納(Robert Brenner)以馬克思理論作研究出發點，首先批評所謂的“新馬爾薩斯派”，他認為有些經濟史學家，在分析長期經濟循環的時候，只以人口和資源的對比來分析歷史的演

變，而忽略了階級形成與階級鬥爭兩個重要因素。布氏的文章以比較英、法的歷史發展為出發點，從而闡明他本人對政治與經濟之間互相影響的看法。

《古與今》雜誌一九七八年的七十八、七十九、八十期，共登載了九位學者的七篇評論文章；除了英國馬克思派史學家羅德尼·希爾頓（Rodney Hilton）基本上贊成布氏的論點外，其他幾位英、法德的學者不是否定布氏的論點，便是批評他立言空泛、實證不足。一九七九年八十五期又刊登了一位捷克學者的論文，間接支持了布氏的論點。這場論戰迄今最後的一篇文章，是布里納在一九八三年《古與今》九十七期的一篇非常詳盡的回答，重申他五年前的主要論點。以下我們先介紹布里納的主要觀點，然後再簡述反對學者的批評。

布里納以十三世紀為研究起點，指出英、法兩國的農業發展和社會結構大同小異，基本上站在同樣的歷史演變階段。那麼，為什麼工業革命先在英國發生，而十九世紀的法國尚是一個農業社會呢？布氏認為英國之農業資本的累積，主要依靠英國十七、十八世紀的商業化大農場，而大規模農業生產的實際起源是十五、十六世紀間英國地主階級勝利的結果。

反觀法國農業，跟英國農業同樣經歷過中古後期的危機後，在十五世紀却走上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英法百年戰爭後，法國農村飽受戰火摧殘，一片蕭條零落。法國的貴族地主階級，不得不減輕封建剝削。此外，法王室爲了要建立鞏固的中央皇權，遂與民休息以恢復國家元氣，又支持農奴擺脫封建貴族地主的枷鎖，以增加中央賦稅的來源。十六世紀初的法國，是一個無數個別